

韦定广等 著

历史与理论

——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定广等 著

历史与理论

——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参与本书研究与撰写者：

韦定广 倪稼民 刘新宜 罗剑明
王 鹏 庄振华 谢春红 马建光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历史与理论: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韦定广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 - 7 - 208 - 09937 - 1

I. ①历… II. ①韦… III. ①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
文化事业—建设—研究 IV. ①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9156 号

责任编辑 秦建洲
封面装帧 张志全

历史与理论

——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韦定广 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52,000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937 - 1/D · 1869

定价 36.00 元

前 言

本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文化思想及社会主义执政党文化建设问题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之一，在内容上与另一成果相衔接，即表现为《后革命时代的文化主题——列宁文化思想研究》的自然延续。与前者着重以列宁文化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有所不同，这项成果主要沿着列宁晚年提出的俄共（布）成为执政党后存在文化上“被征服”危险思路，进一步拓展视野、面向实践，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角度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执政党自身的文化建设难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①党的建设面临多重任务，而作为东方大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执政党，首当其冲的是必须努力加强党自身的文化建设。这既为现实挑战所决定，同时也是历史经验教训留给人们的深刻启示。众所周知，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同，在 20 世纪特定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下，共产党主要在落后国家通过对内对外战争获得执政地位。军事上的伟大胜利容易成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执政“资本”，并进而产生对执政困难的忽视。无论是十月革命后的俄共（布）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倾向，结果导致对成为执政党后自身缺陷认识不足。经济落后固然是这些国家共产党实现成功执政的重要障碍，然而从共产党主观条件分析，自身文化落后或建设中的缺陷或许是执政困难甚至失败（如苏共）的更重要原因。

从文化角度分析、总结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的得失成败，特别是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已有人提出并做过一些零星的工作；但所取立场、角度不同，或方法、工具有异，结论未免精彩纷呈、莫衷一是。难在如何使分析既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同时又恰如其分、深入透彻；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文化宿命论观点，使分析、研究的目的着眼于建设，着眼于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以便更好地完成其历史使命。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党的十七大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9 页。

有鉴于此,本书虽然作为一项集体研究成果,在理解深度、文字风格等方面有所差别,但各位研究人员在总体上能够达成以下共识:

——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考察出发,在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政党在落后国家执政特征、过程以及经验教训基础上,探讨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的文化建设问题;可能有些问题提得比较尖锐,或者也有个别观点存在偏颇,但基本立场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即指出“病症”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或者是为了更好地“治病”。

——侧重于从精神领域即狭义层面理解、接受和使用“文化”概念,并注意到将隐型文化和显型文化相比较,认为前者对于落后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制约性因素更加突出与重要;因而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建设中有效克服,自然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方面。

——周详而面面俱到地论述共产党自身的文化建设,既没有必要(例如重视显型文化的建设,这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也做得不错,更不用说在当代中国“学历化”背景下,我们的党员干部大多已经很“有文化”了),同时也是我们力所不及;根据课题设计,必须选择那些重要而又为国内外相关研究所忽视的内容,展开既具有理论或学术价值又不乏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

——作为执政主体的人,既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任何具体行为又受其文化(观念、思想、情感、心理等)的支配: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分析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面临文化制约以及必须重视自身文化建设的主要逻辑依据与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注意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的运用,目的是使文化分析非但不脱离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而且更可以借此理清与“执政”行为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

——虽然课题名称指涉“社会主义执政党”,但考虑到与列宁思想的关系、考虑到必须选择在20世纪真正具有代表性并且产生世界影响的党,所以全书实际主要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作为研究对象;或者说是以苏、中两党为典型案例,分析总结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时文化层面的一般规律与特点。

全书除“导论”外,共由五章组成。

“导论”具有“总论”性质,主要从一般性上概括分析社会主义执政党必须注重和加强自身文化建设的缘由,当前的着眼点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以史为鉴、努力改进和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文化武装。其余五章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以苏联共产党作为研究对象;其次是着重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及具体操作问题。

第一章到第三章是第一部分。

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传承者与推动力量;而共产党之所以在文化上拥有超越其他党派的先进性,也因为其大多数领导人物不但是现代知识分子,而且不同程度地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时代产生的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然而另外一方面,任何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的成员、作为所属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又都会受到民族习惯、习俗、传统等的浸染与制约;也就是说,即使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也难以避免或完全克服民族文化落后性的深刻影响,并且会通过自己的行动将这种落后性体现于党内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分析与认识曾经长期为人们所忽视,事实上从苏共和中共的执政实践考察,很可能恰恰是这种落后性在深层次削弱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并且使其文化建设面临严重困难。本书第一章研究主要是从苏共的情况出发,通过考察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及其文化缺陷,研究从列宁时期开始党内知识分子文化状况。本章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俄(苏)共党内知识分子区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一是以列宁为代表,曾经长期在欧洲国家生活过;二是以斯大林为代表,一直在国内做地下工作。后者更加“实际”然而也更多地受到民族文化落后性的负面影响。当这些人成为“知识权力人”之后,在具体执政中虽然也重视党内的文化建设,但往往对于以传统、习俗等形式出现的隐型文化落后性因身陷其中而难以“自觉”。同时,还会因其执政中的“粗暴”(这是列宁批评斯大林的一个观点)、武断甚至专制,会给党自身的文化建设带来各种危害。对于这样的危害,该章概括为“话语垄断”,同时认为由此又导致党内“万马齐喑”现象——“话语失却”。从极少数人的话语垄断到党内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话语失却,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执政党在进行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值得深刻记取的重要教训之一。由此,可以引申出关于如何加强党自身文化建设的许多有价值的思考。

第二章大致是前一章的自然延续,有所不同的是:如果说第一章的考察视角是人(如马克思所形容:“死人抓住活人”),第二章则主要着眼于执政过程中旧文化对具体制度、理念以及执政方式怎样形成深度制约;如果说第一章侧重从现代人(党内知识分子)与民族传统的关系角度考察其执政的历史延续性与制约性,那么,第二章则主要通过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以及共产党执政的理论设想比较中,剖析苏联共产党执政是如何逐渐背离初衷、背离先进文化方向的;如果说第一章完全是历史性的考察(主要限于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并从中或演绎或归纳出一些关于如何加强党自身文化建设的思考;第二章主要聚焦于斯大林之后时期,而且在文化建设的理论探讨方面也更加深入(如涉及领袖与人民的不同作用)。

文化既具有不同领域、不同层面,而在同一领域或层面,还会存在不同层次。对于共产党执政而言,最重要的文化影响也许是政治文化。因此在前两章的基础上,第三章则以苏共时期的政治文化建设为重点。

相比较更为宏观的文化,政治文化属于亚文化的一种。所谓“政治文化”,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观点,主要体现为公众对政治的态度以及他们在一定政治体系中的角色。^①通过政治文化,人们既可以观察一国政治如何运转,同时更可以了解全体公民的政治行为模式。对于任何新政权、新社会而言,都存在着如何建构新政治文化难题;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既无例外,而且由于共产党执掌政权的艰巨性、复杂性,显得更为重要。另外,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其实又是执政党文化水平的一个反映。所以,该章没有对苏共执政时期的政治文化展开全面论述,而是着重选择两个关键时期:初期和晚期。后十月革命之初的难题是如何破旧立新、努力塑造适合共产党执政需要的政治文化。作者将重点放在政治象征建设方面,既总结其成功之处,同时也分析在建构过程中留下的严重缺陷。应该承认,这些缺陷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什么人主观意愿所为,而完全是文化不自觉的结果。如果说初期的建设主要是为了与旧时代、旧社会的政治文化旗帜鲜明地划清界限;那么,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建设则带有重构性质,即至少最初目的是为了纠偏、为了改变共产党执政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然而实际后果却是:从提倡公开性、多元化到形成反体制的公共领域,蹩脚的或完全不成功的建设最后成为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助推器。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自身文化的某种不足,使重构演变为解构。然而从更宽广的视野讨论苏共时期的政治文化建设,无论是初期的建构还是晚期的解构,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执政党自身的政治文化成长提供某种启示。

第二部分由第四章到第五章组成。

这两章直接从中国共产党当前建设中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或挑战出发,探讨党自身文化建设的重点、举措与方法等内容。

党内存在严重腐败,这已经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影响共产党顺利执政、成功执政的最大制约。产生党内腐败的原因很多,文化因素是一个虽经常不为人们注意或重视,然而却是最深刻又最难以根治的方面。第四章的贡献在于没有将文化的分析简单停留于泛泛议论层面,而是将一定的文化传统当作党内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缘由。这样的分析并不构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全盘否定,只是强调在我们的

^① 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著:《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八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传统中确实有助长腐败的各种“因子”存在,从而才使党内腐败如此具有某些民族的风格与特点。尤其重要的是,这样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承认党内腐败的不可避免性,只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更需要增强党性锻炼与先进文化建设,以提高自身抵御腐败的“免疫力”。由此,该章才能够从如何防范和遏制党内腐败出发,在文化建设的理论探讨方面提出诸多有价值的思考以及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第五章主要探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以及如何建设问题。

应该承认,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加强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战略性举措,同时也是作为执政党具有更清醒“文化自觉”的表现。提出这样的建设目标至少表明:从对世界范围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总结中,特别是从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应对各种挑战、提高执政能力的考验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认识到自身文化上的缺陷或不足;并且这些缺陷或不足远非提高官员的学历层次就可以轻易获得克服的,而必须借助于长久而全面的“学习”来解决。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号召中,我们体会到了它与列宁——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的创始人——晚年“学习,学习再学习”之间的联系,体会到了它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当年“进京赶考”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然而,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如何才能使中国共产党真正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学习型政党。为此,第五章的作者从增进学习的时代内涵、丰富学习具体内容以及转换建设思路与构建行动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特点是能够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出发,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历史考察还是在理论探讨方面,我们丝毫没有将本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当作最终结论的打算。由于该书主题涉及面异常广泛而且许多内容在国内外尚缺乏深入分析,更兼之文化议题本身具有人云亦云、莫衷一是的特点,所以,在一些方面很难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我们的贡献可能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是明确指出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必然面临文化制约,并且这种制约往往并不是由显型文化所导致,而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为民族的传统、习俗、心理等隐型文化发生作用的结果;另外,这种制约不但表现为具体人的具体行为,而且会反映于一个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的具体制度、理念以及方式、方法等。

二是指出存在文化制约的目的是进一步增进共产党执政中的“文化自觉”,从而既提高对加强党自身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对于如何提升政党的文化水平也有更加明确的主张、意图或举措。

三是分析方法的贡献。如何研究文化,如何探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如何从提高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水平、执政能力出发,探讨其加强自身文化建设问题,这经常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目前国内文化建设的重要缺陷之一,是就文化谈文化因而将文化研究甚至文化建设问题变得既玄虚又令人莫测高深;缺陷之二,则是笼而统之或大而化之,即什么都讲最后又什么都没讲。^①我们的做法是努力从历史过程出发,从具体实际出发,也就是从政党执政角度考察其文化的实际存在方式及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和加强自身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或政策建议。

围绕本书主题,不能说我们就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我们所做的只是一种尝试和努力,以期能够激起国内同行们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命更加灿烂、执政成果更加辉煌。

本书遵循课题负责人的统一设计与研究思路,分别由学有专长、研有特色的人员撰写而成。本书各章主要撰稿者如下:导论——韦定广、罗剑明,第一章——倪稼民,第二章——刘新宜,第三章——王鹏,第四章——庄振华,第五章——谢春红、马建光。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本书固然难以避免因集体合作而产生的许多缺陷,但同时也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与思想。所以作为课题负责人,还是非常高兴地向各位合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的勤恳工作与始终如一的奉献与承诺,才使本课题研究得以顺利完成。

^① 有关目前国内文化研究领域诸多缺陷及其表现,可参见赵勇:《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原因的原因,还是原因	1
一、文化制约的共同规律与特点	1
二、重视文化建设是应对执政挑战的必然要求	6
三、努力改进和加强执政党自身的文化建设	10
第一章 党内知识分子文化状况与苏共文化建设之深刻教训	15
一、党内知识分子:文化承载与建构主体	15
二、不同知识权力人如何影响历史	28
三、知识分子在党的文化建设中:争论及其偏颇	53
四、话语垄断与话语失却:执政党文化建设的重大教训	66
五、结束语: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再思考	87
第二章 苏共执政文化制约分析:制度、理念与方式	91
一、新制度理论设想与旧文化的侵蚀	91
二、执政理念的历史考察:从立党为公到执政为“己”	114
三、执政方式演变:旧政治复活	128
四、文化制约再透视及其理论探讨	139
第三章 重构与解构:苏共政治文化建设二题及其经验教训	163
一、正题:初期的政治象征建设与政治文化	163
二、反题:晚期的公开性、反体制公共领域与政治文化	178
第四章 防治腐败: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新思考	195
一、执政党文化建设面临严峻挑战	195
二、腐败与文化	199

三、党内腐败的文化传统缘由	208
四、现实文化消极影响:新的土壤	228
五、防范和遏制党内腐败的文化思考	236
第五章 建设学习型政党:面向现实与未来的探索	247
一、世界部分政党执政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247
二、提高执政能力:学习型政党的时代内涵	254
三、丰富学习内容:学习型政党的实践要求	263
四、建设思路转换及其行动模式	275
参考文献	300

导论 原因的原因,还是原因

作为社会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必然涉及诸多方面内容,然而根本之点应该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与其他方面建设,存在着某种隐蔽性的逻辑关系。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只有充分意识到并重视执政中客观存在的文化制约,我们才能够对诸如怎样总结 20 世纪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的经验教训、如何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提高执政能力,以及如何真正成为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者等许多重大问题,有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并得出较为准确的认识。

一、文化制约的共同规律与特点

论及 20 世纪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列宁的地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不但领导俄共(布)率先夺得政权,而且还在于理论素养全面而深邃,特别是对西欧文化和文明有着深刻的体验与认同。尤其值得注意的,通过吸收当时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再加上个人从政治实践中获得的体悟,使之更加注重以传统、习俗或民族心理等方式存在的隐型文化^①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从而成为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提出并广泛分析共产党执政中面临文化制约难题的领袖人物。列宁在谈到文化传统的历史惯性特征时,曾非常形象地阐述道:“旧社会死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遗害我们。”^②1922 年 5 月下旬,列宁在给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全部生活中和我们的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弊端就是纵容古老的俄罗斯观点和半野蛮人的习惯。”^③口述于 1923 年 3 月 2 日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作为生前最后一篇重

① 文化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广义的文化涵盖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所取得的一切有价值成果在内,但对于这种性质的文化,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更倾向于以“文明”来概括。狭义的文化主要存在于人类的精神领域,有人将之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显型文化,即可以通过直接传授方式获得的,例如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各门社会科学、系统化了了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等;二是隐型文化,即主要通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途径而形成的部分,包括各种传统、习俗、民族的习惯性心理与思维方式等。

② 《列宁全集》第 27 卷,中文第 2 版,第 407 页。以下引用《列宁全集》,均出自同一版本。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2 页。

要文献,针对党和国家机关特别是中央工农检查院的种种弊端,忧心忡忡地指出:“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唯恐不足以引起世人的充分注意与警惕,列宁紧接着又补充道:“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①这说明,列宁逝世前已经对俄共(布)执政前景表现出深刻的忧虑;而导致忧虑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对共产党自身面临多重文化因素严重制约的清醒省察。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官僚制度复活”(列宁)以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定苏联共产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的因素当然很多,或者说,也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由产生的“合力”之结果;在这其中,被列宁所看重的文化,难道不具有某种内在逻辑的性质?

共产党执政中的文化制约问题首先由列宁提出,并且以苏联共产党的种种错误行为及最终垮台彰显其内在必然性逻辑。其实不但是苏联,凡是在非西方落后国家执掌政权的共产党几乎都会面临同样困境;差别主要表现为因各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特点,而在制约的具体内容及其程度方面有异。例如中国共产党,固然不存在类似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特点的狭隘民族主义传统;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失败到60年代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传统文化的阴影已无处不在;10年“文革”则更是封建政治文化的大暴露。1980年,邓小平分析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主要存在五大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与共产党人执政理念、执政宗旨完全不相符合的弊端?是封建主义在从中作祟。邓小平强调:“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②这里的封建主义,不是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是主要作为传统、习俗或民族心理存在并绵延至今的文化。反观当下,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且难以治理的“一把手”现象、形象工程、党内腐败等等,也都与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存在着程度不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一般规律层面,共产党执政中的文化制约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执政理念。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4—785页。

^②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334页。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已故领导人叶剑英、李维汉、胡耀邦等,在“文革”后也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封建主义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深刻影响。叶剑英认为,“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实际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参见:《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1页;另见胡德平:《叶剑英谈批判封建主义思想》,2008年12月1日《北京日报》)

由于不同国情基础、时代条件,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时,客观上都需要经过民族化的处理。无论“俄国化”还是“中国化”,其中都包含着用民族文化的视野、方法、概念甚至话语体系去阅读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必要的、积极的,即不但为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国情、时代相结合所必需,而且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具体民族国家范围的大众化、社会化。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因此而生;并且,这种文化误读不是一个简单的教条主义或反教条主义所能够概括。例如,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根本之点在于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性普遍交往为前提,并且在总体上将新社会的产生当作“自然历史过程”。俄罗斯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村社”主义,中国古代则存在着对“大同”理想的不懈追求;由于这两种文化传统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都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因此,此类资源一方面有助于民族在近代以来多种政治思潮的博弈中更加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另外一方面,这种表面的或形式上的相似又极易导致文化上的误读,即用古代农民的社会理想解读、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于是,以现代政治哲学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正义思想被曲解为农业社会对“等贵贱、均贫富”的渴望;根本上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高度发达“自然”结果的社会主义,成为可以通过类似农民起义(革命)便可一蹴而就、大获成功的“乌托邦工程”;以个体自由为前提、实现社会解放与个人解放辩证统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理念,在有着浓厚专制主义和等级臣属传统的东方文化土壤中,却生长出完全无视个人利益和个体独立的封建主义色彩的“集体主义”……结果,“社会主义”实践后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却成为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对象:“完全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对财富的“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社会)竞争的本质”、由“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导致社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①

共产党执政的本质是让广大人民当家作主,是要充分代表与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追求不但是有效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在这方面理应超出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所能够达到的水平。但是,一方面古代社会就没有“人”,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前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本主义文化启蒙运动;另外在特定的民族传统文化语境下,原本浸透着现代人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本主义精神的一套话语体系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涂抹上封建主义的油彩。人民当家作主在更大程度上被理解成古代清官的为民做主；以每个人获得全面发展和成为“自由人”为内涵的自由，衍化为对诸如不服从组织决定之类行为的解释，或者将原本在马克思著作中与自由等价的解放仅局限于狭隘的政治层面；人权则被解释为完全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在将民主、自由、人权等一类价值理念完全奉送给资产阶级之后，共产党执政中所能够体现的，自然是高度集权、官民依附、家长作风等，甚至出现各种各样以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之名义侵民、扰民、害民的野蛮行径。

其次，执政的基本制度或体制、政策等。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共产党如何执政留下系统论述；列宁在短暂的执政实践中做过一些探索，但许多内容也只属于特定背景下的临时措施。因此，苏联和中国两党的执政制度主要是在较长时期实践中逐步摸索、积累而成。国内外一些制度主义者时常强调某种制度的超文化特性，其实任何制度都必须以一定的文化作为依托，甚至如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所言，“文化是制度之母”。^①不管是依据现代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还是立足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民主和法治既是共产党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理应成为执政制度建设的两大本质要求。然而，具体的制度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来进行选择或制定的，而人又是受民族的文化支配或制约的；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在执政中，当将西方国家近代以来形成的政治文明成果统统定性为“腐朽”、“没落”之后，就只能面向民族的过去，也就是从历史上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遗产中淘取所谓“精华”并作“古为今用”之需。例如，现代国家都必须是法治国家，政党执政也必须形成一套以遵守国家法律、依法治国为前提的民主制度。然而在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更普遍、更深入人心的却是人治、是“朕即国家”、是“刑不上大夫”……斯大林强调，凡是党作出的决议、发出的指示甚至口号，都应“具有实际决定效力”，“具有法律效力”^②。发展到最后，是斯大林个人的任何言论或指示都必须当作法律来执行。制度层面不存在制约或监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执政变成为党的领导机构甚至个人全面包办、控制或管理国家和社会——这一切的背景，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对封建时代权力制度及其运行规则自觉与不自觉的仰慕、学习或执行的文化心理机制。邓小平曾经分析过：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8页。

“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①30年前,这是“全国各级”的普遍现象,即使到今天,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提出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主张,并且更加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然而由于文化原因没有消除,事实上“一把手”现象仍然带有强烈的制度色彩。

再次,是在个人行为、作风、人格等方面。

政党执政无论其理念、制度、政策还是方式,最后总是要落实并体现为具体个人的行动。任何个人既是文化载体又都是文化存在物,思想、情感、品行、心理等无不镌刻上一个民族文化的烙印。列宁在批评托尔斯泰主义内含“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时,曾经指出:“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②群众是这样,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也在所难免。由于国情特点及革命历程的特殊性,在落后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内广泛存在着“农民文化”的深刻影响。列宁晚年多次列举和痛斥俄国中世纪性质的“农民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其中尤以奥勃洛摩夫精神为典型。奥勃洛摩夫精神实质上是在异常落后封闭的小农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人生态度与文化心理,表现为因循守旧、懒散怠惰、整日沉湎于幻想和办不成任何具体实事。如果参照阿尔蒙德所提出的政治文化类型分析,大体属于“区域一服从型”,这与共产党人积极进取、主动参与、不断创新的政治要求显然大相径庭,因而列宁对党内的奥勃洛摩夫精神深恶痛绝。1922年2月,他在批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存在着拖拉作风时,指出“这在我们这个‘奥勃洛摩夫’共和国里是司空见惯的。”^③同年3月,他在另一篇文献中大声疾呼:“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对这种人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④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奥勃洛摩夫,却存在着阿Q精神:“革命”了,“革命”了之后要什么就有什么——无限的权力、无数的钞票,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中文第2版,第34页。列宁后来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也曾以大致相同的语言论述过旧价值体系对革命胜利后人们“心理和情绪”的重要影响。(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③ 《列宁全集》第52卷,第270—271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2—13页。奥勃洛摩夫为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同名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更多的情妇、更足的威风……惧怕“假洋鬼子”的文明棍，却又任意调戏、欺负比他更弱小者——“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①，邓小平的如此批评真可谓入木三分。中国党内存在的行贿收贿、权力腐败背后独特的民族文化因素，早已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另外，诚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皇权主义、国家主义是农民政治文化的普遍表现。^②古代中国的重要政治特征之一，是家国天下；在此背景下，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臣属依附特征尤其突出。主要受这一文化传统的支配，至今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旧社会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③

对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中所犯的重大错误或遭受的重大挫折，领袖人物个性或人格缺陷在其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又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归咎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或影响？这固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而且也确实是难以度量的难题。但是从实际作用分析，恐怕谁也不可否认斯大林、毛泽东鲜明的文化个性特征对领导执政所产生的、包括正负两方面的重大作用与影响。

二、重视文化建设是应对执政挑战的必然要求

与具体制度、体制或领袖人物的决策相比较，文化对执政的制约作用不但较为隐蔽，而且主要是间接性的，即渗透于制度、体制和具体决策等，或者是通过它们而发生影响。因此，从分析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中的经验教训角度，文化因素也可以说是原因的原因。原因的原因还是不是原因？曾经有人引用哲学家悉尼·胡克的一句话提出质疑：“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④语言的表达颇有几分俏皮，但用作否定文化成因分析的依据却未必合适。对问题原因链的追究直至“终结一环”（如作者在文中举例，对司机因酗酒肇事的追捕达到一千多年前酿酒业的发明者），当然毫无意义。要分析、肯定传统政治文化对共产党执政的消极影响，在中国必要将孔夫子拉出来批斗一番（“文革”期间我们正是这么做的），而在苏联则要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页。

③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

④ 参见朱学勤：《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南方周末·学者论坛》1997年1月17日；后来此文收入作者个人专集：《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